

发生学与类型学视域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从“黑猩猩的政治”说起

陶庆 马方云

摘要 回溯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即回溯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问题原点”，是破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瓶颈问题的有益尝试。发生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仍处于分割断裂的状态。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以隐喻的形式蕴含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流变的内在同一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选择，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类型选择验证了人类只有在不断调整完善国家与社会关系过程中才能实现“善的生活”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 观念发生性 类型流变性 “问题原点” “善的生活”

作者陶庆，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 200234）；马方云，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8-0069-11

美籍荷兰人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弗朗斯·德瓦尔（F. B. M. De Waal）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黑猩猩的政治”^①系列研究成果，颠覆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传统“神话”，给这一传统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契机：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不是仅仅属于人类（注：以区别于非人类的其他灵长类）、更不仅仅属于文明人类（注：以区别于非文明的原始人类）等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权”“专利”；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不仅能够像人类一样，进行社会生活，自己制造工具，进行“语言”交流，而且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有意识的政治性谋略，甚至有秩序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所有批评中没有一个是能抹杀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人类只不过比猿类做得好得多而已，人类与猿类并没有根本的区别。”^②因此，回溯到人类社会存在之前状态譬如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即回溯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问题原点”，恰恰是破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瓶颈问题的有益尝试。

① 弗朗斯·德瓦尔（F. B. M. De Waal）是美籍荷兰人，美国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他在 1975—1979 年期间通过对阿纳姆的黑猩猩“田野研究”而撰写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是深受政治家等各类跨学科研究者与工作者追捧的畅销书，该著作以政治人类学范式的手笔“深描”黑猩猩能够围绕着权力与性行为等最基本利益需求所展开的激烈竞争和剧变联盟，指出灵长类的种种行为并不是动物本能，而是具有与人类一致的政治智慧等惊人结论。该著作以独特而发生学视角，透过黑猩猩的政治生活，洞悉了人类最基本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本质内涵。F. B. M. De Waal. 1982 / 2007,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Harpercollins /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 德斯蒙德·莫里斯：《“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黑猩猩的政治〉推荐序》，参见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赵芊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

发生学具有天生的跨专业交叉学科特征,强调人类观念逻辑的发生而非社会单纯事件的产生,即着力于研究“观念的发生”与“逻辑的推理”,以此探究人类主观认识的演变,研究人类知识结构生成的过程等,因此超越了上述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人类政治常识。“发生认识论旨在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态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各个水平发展的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①换言之,发生学关注重点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认识的生成过程和发展历程,研究人类政治生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观念起源而非事物产生,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综合性、复杂性及其交叉性。

在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话语体系里,人们一直被告知,人与其他动物是根本不同的。但是,“当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政治动物时,他不可能知道他的说法到底有多么确切。我们的政治活动看来是与我们的近亲们所共同分享的某种进化的遗产的一个部分……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那种指责我有意或无意地将人类的模式投射到了黑猩猩行为之上,这也是不正确的。相反的说法倒更接近事实;我的关于黑猩猩行为的知识和经验已将我引上了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人类行为的思路了”。^②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说“黑猩猩的政治”具有了“类国家”的政治形态——共同体高等级活动形式——政治共同体形态,那么这些灵长类也同时具备“类社会”的自治形态——共同体高等级活动形式的“胚胎”形态——社会共同体形态。“我们对猿的了解仍然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他们的社会组织。”^③回溯到人类社会存在之前状态譬如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早在现代人类诞生之前的黑猩猩政治活动中找到了萌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朗斯·德瓦尔所著系列黑猩猩论著开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学研究的新领域,基本上具备以下若干范畴。

第一,互惠合作的政治社会。阿纳姆公园是由人工护河围绕而且大部分区域都被电栅栏隔开的封闭岛屿,弗朗斯·德瓦尔笔下黑猩猩群落有23个成员,4个雄性黑猩猩(注:交替建构统治地位),9个雌性黑猩猩及其10个幼仔们,建构出3个二级子群(注:“大妈妈”子群、“吉米”子群、“特普尔”子群)。^④他们衣食无忧,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从事社交与精神生活,这是他们能够进行“社会化”的基本环境,由此形成类似人类社会的“国家统治”与“社会运动”。对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多次“政变”的观察性研究持续了近4年时间(1975—1979),权力更迭、“政治斗争”细节丰富,政治主角分别是雌黑猩猩“大妈妈”(注:估计大约40岁的雌黑猩猩,一般圈养黑猩猩寿命的最高纪录是59岁),雄黑猩猩一号“耶罗恩”、二号“尼基”与三号“鲁伊特”。政治社会化的环境背景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观念发生、信仰孕育、人文滋长的精神家园。黑猩猩群体有着与人类社会一致的互惠合作机制,经常得到支持的黑猩猩会以更大的宽容或为其梳理毛发来表示感恩报答,彼此在社会生活中互惠交换着权力、性爱、友情、支持、容忍,同时也彼此对敌意或对抗采取对等的立场与行动,从而形成了平等互惠、互利共赢、善恶有报等类似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的基本规范。^⑤

第二,网络结构的政治组织。黑猩猩群体组织呈现出至少三种具有网络化水平的社会结构。一是垂直方向的递进等级制(纵向结构),与水平方向的平等互惠制(横向结构)等两种形态社会组织;雄性及雌雄之间一般多呈现出递进等级制社会组织倾向,雌性及亲子之间则多呈现出平等互惠制社会组织倾向。二是形式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合法律性统治),与实际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合法性统治)等两种形态政治控制方式。形式上的统治,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低等成员主动向高等成员输送的单向性“问候”仪式,以维系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团结;实际上的统治,是指低等成员黑猩猩依附于一个当时在场的地位更高的第三方,从而导致其社会地位临时性上升并能够支配一个平时比自己地位高的另一个黑猩猩。三是静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动态变迁的社会秩序等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雌黑猩猩们趋向尽力调解雄黑猩猩们之间冲突以避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王宪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19页。

②④⑤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第257、54、249页。

③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导论”,第3—4页。

免竞争,需求安全环境以便养育后代——稳定有序的社会氛围符合她们的价值取向和切身利益——她们喜欢像雄黑猩猩耶罗恩那样的干练沉稳首领,而不是像雄黑猩猩尼基那样的年轻“暴发户”。^① 雄性黑猩猩们倾向于建立类似人类社会等级森严组织形态,从而获得凌驾社会之上的绝对统治地位,青年一代总是试图挑战既有统治秩序,设法在性交与资源方面扩大自己的占有份额,因此整个黑猩猩群体的统治秩序时刻处于变化莫测的动荡之中;既有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必须提防任何潜在的挑战者——他们甚至是仅次于外敌的危险“敌人”。^②

第三,社会结盟的政治行动。社会结盟——两个以上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联合——是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政治现象:每天结盟事件多达5-6起,一年结盟活动高达1000-1500起。结盟是高度社会性的,旨在取得类似“C”支持“A反对B”等政治目的。^③ 黑猩猩结盟类似人类的社会契约与社会运动,具有情感偏好性、立场持续性与行动忠诚性。“当两只猿互相打起来或互相威胁时,第三只猿会决定参与冲突并站在其中一方一边,结果形成两猿结盟共同对付一只猿的局面。在许多情况下,冲突会更进一步扩展,更大的联盟也会应运而生,因为各种事情都发生得很快。”^④ 作者通过比对人类与黑猩猩“结盟”的性别差异,发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女人(雌性)的联盟往往是被动与助人式的,而男人(雄性)出于政治目的,即是主动与功利性的。^⑤ 无论何种联盟行为,都出于在社会行动中增加有利地位甚至取胜等目的,无疑这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第四,和平和解的政治价值。黑猩猩无论雌雄,都有强壮体力,但更有强大自制力,不会向群体内对手使用致命暴力,更不会在冲突中撕咬对方的要害部位。“尼基(注:最为健壮的青年雄黑猩猩)实质上带着一把刀(注:指‘犬牙’),然而,在与雌黑猩猩打斗时,他却总是赤手空拳。”^⑥ 德瓦尔还惊奇发现,一场黑猩猩之间的殊死搏斗刚刚结束还不到一分钟,坚冰会突然消融,敌意会自动化解;原先对手急切奔向对方,长时间热烈地互相亲吻和拥抱,热情认真地互相梳理护理毛发。^⑦ 黑猩猩发生冲突后,没有人类社会中普遍常见的所谓“尊严”“人格”等偏执狂热的长期仇视心理,相反他们一般选择尽快与对方达成共识、调解冲突,黑猩猩群体已经发展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政治意识”——友爱和睦、和平和解——才是社会共同体生活的真谛。反观人类,作者深深自责:“我们(人类)可不可以不将我们的脑袋伸进沙堆中来保持我们的尊严感呢?”^⑧

第五,权力博弈的政治秩序。亚里士多德将人比作是“政治动物”,德瓦尔则得出了黑猩猩动物具有“政治人”的相反结论。“我所观察过的动物们显然都在努力获得一个较高或更高的社会地位……黑猩猩们都是会为一个较高或更高社会地位而努力奋斗的。”^⑨ 与人类社会流动中的个人奋斗相类似的是,黑猩猩群体社会地位中最显赫的“符号”同样是权力,他们拥有权力意志,渴望更大更高的权力。雄性权力欲意在争夺繁衍权,雌性权力欲重在维护生育权与生存权。个人奋斗必须采取策略谋略,这一方面黑猩猩采取的政治手腕同样让人类自叹弗如:包括试探、威胁、抗命、联盟、离间、笼络、收买、特权、交易,等等,“他们是擅长精妙的政治策略的”^⑩,具有与人类一样的政治才干与政治智慧。

第六,社会调解的政治干涉。黑猩猩群体社会维护系统,除了“容忍”与“和解”等政治策略之外,还有第三方介入冲突双方的社会调解机制——可以是威慑信号也可以是制止行为。“在(政治)这一领域,黑猩猩们显然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技术(发明的)才能低于我们的(相应才能);但若论社会活动(主要指政治活动)的才能,对于(能不能)下这样的判断,我就会犹豫不决了。”^⑪ 比如,在孩子争吵打闹等一般事务中,群落中年纪最大、地位最高的雌黑猩猩“大妈妈”,朝向闹事者挥舞着手臂并大声吼叫起来时,调皮的孩子们马上就停止了吵架。^⑫ 又如,当一大群雌黑猩猩在沙地上尖叫打斗失去了控制时,作为首领的鲁伊特直接跳进猿群并将她们逐个打得彼此分开,他给任何一只“不听话”仍在斗殴的黑猩猩挨个抡上一巴掌,以“以暴制暴”的干预形式调解纠纷。^⑬ 还如,如果青年雄黑猩猩尼基贸然攻击雌黑猩猩安波,首领鲁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第237—240、240—241、35、35、241、119、130、33—34、227、47、283、40、144页。

伊特就会帮助安波赶走尼基,这种选择性直接干涉,目的也在于维护社会正义和集体安全。

第七,以德服众的政治宽容。成年雄性黑猩猩在阿纳姆公园动物王国中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像我们人类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取决于体魄强健与暴力威慑——相反,雄黑猩猩们对于雌黑猩猩和幼小猩猩等“弱者”都能克制自己“脾气”,显示出普遍一致的宽容和关爱。“黑猩猩之间的社会等级次序的偶然的倒转现象决不是罕见的。所以,黑猩猩之间的社会等级次序经常被称作‘柔性的’或‘具有可塑性的’。一只不大于两三年的年幼黑猩猩有时也能迫使一只成年雄性或雌性逃跑,甚至强迫他们做某种事情。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在游戏性的事件中才会出现,而是在严肃的冲突中也会出现,例如:在母亲的支持下,(小黑猩猩)乔纳斯就能迫使(雌黑猩猩)弗朗耶为他哺乳。”^①黑猩猩在整个群体中的统治地位,异乎寻常地取决于他在“民众”中的威信高低与认同大小,即取决于社会公信力,这是宽容政治的重要元素。黑猩猩族群中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一方面体现了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但另一方面又有着与人类社会一样的情感支持、公德公信。可以看出,黑猩猩政治生活不是某些政治学家所鄙视的那种下流、肮脏与混乱,而是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甚至带来了一个民主的结构”。^②黑猩猩的政治“也是建设性的,对于被看作政治动物,人类应该视为一种荣耀”。^③

现代遗传学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基因组差异不足1.6%——决定了文明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物种差异——但没有隔断灵长类动物“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与文明人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同一性;这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学研究,从“黑猩猩的政治”中能够找到答案的根本原因。

尽管黑猩猩群体“类国家”与“类社会”活动,充满政治统治与社会自治的关系网络,充斥权力斗争与帮派结盟,演绎出政治谋略、联合斗争、调解仲裁、集体领导、互惠和平等人类社会才有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但皮亚杰提出的“认识的起源”并非事物或者事件的开端。因此,当发生学这一范畴引入到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需要特别“警惕”,必须消除那种把“起源的研究”与“认识的建构”完全对立的态度,也就是说,绝对的事物起源,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的绝对起点,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无需在历史的长河中“刻舟求剑”。“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的问题,或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④但是,发生学有关“国家”的认识则是有一个具体的建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对于自身共同体生活的“观念”孵化。“坚持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探讨,并不意味着我们给予这个或那个被认为是绝对起点的阶段以一种特权地位:这倒不如说是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未经清楚界定的建构,并强调我们要了解这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就必须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尽可能多的阶段。”^⑤发生学探讨的不是单个事物的产生原点,而有关该类事物的人类思维萌芽、形成、成熟的一般过程。毫无疑问,“关于权力意志和政治的起源这一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无论国内外学界都还做得很不够,因而亟待加强”。^⑥这正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般观念与内在逻辑。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在语言学和逻辑思想的影响下(如C. S. 皮尔士、B. 罗素等),类型的观念在思想界才获得了一种新的中心地位。那时产生的是非常抽象和一般的类型理论,并在诸多不同领域——如古生物化石学、心理学、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中——形成了系统的学问,谓之‘类型学’。”^⑦类型学运用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范畴,强调流变同一性(注:“类型流变性”):“形态的可变性”与“目标的过渡性”;即着力于研究某种事物的可变性与过渡性,呈现出交叉与跨学科的“模糊性”等特点。分类意识和行为是人类得以认识世界、分析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类型学理论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源于人类的分

①②③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第100、258、6页。

④⑤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第17—18、17—18页。

⑥ 赵芊里:《论动物的权力意志和政治的根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5期。

⑦ 汪丽君:《广义建筑类型学研究——对当代西方建筑形态的类型学思考与解析》,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3页。

类意识和分类活动……分类活动是一种在世间万象中建立秩序的活动。类型学成为许多学科中的一种共同的主题，一种基本的思想方式”。^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类型学主张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区分与界限，因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具有流动性、变动性与更替性等特点，但同属于人类社会共同体组织，是人类实现自身“善的生活”之目标的唯一载体，具有鲜明过渡性。

运用类型学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有几种语意接近但内涵迥然有异的范畴需要鉴别。一是“类型”与“模式”。德·昆西认为两者有根本区别：“模式”是在相同实践条件下能够重复再现某种曾经反复出现的现象与事物，而“类型”并不意味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它意味着人们凭借某种观念与思维，能够勾画出与原本事物具有质的同一性但形式上毫不相干的种种其他现象与事物。因此，就“模式”来说，一切事物都精确明晰，而“类型”则多少有些模糊不清，它所模拟的总是情感和精神所认可的观念与逻辑。简言之，“模式”充其量是僵化的“复制品”，而“类型”则是以隐喻的方式来阐释人类社会特有的理性与观念。^②二是“类型”与“分类”。拉菲尔·莫内欧（Rafael Moneo）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一样，都要对事物进行归类区分研究，但自然科学称之为“分类学”，而人文社会科学称之为“类型学”，两者虽有形式类同，即有本质区分。自然界万物的分类缘于其自然属性的规定性，具有“属”“种”“目”等明确的分类界限；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类属于人类社会生活内部的区分，不具有非此即彼的质的规定性，而具有人类共同体“善的生活”的共同目标，因此其间分类具有模糊性、变通性与过渡性。^③正因为这样，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不同于韦伯的统治类型学^④，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所谓的“传统型统治”“个人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统治”还停留在“分类”或者“模式”等非此即彼的区隔状态，每种“统治类型”之间缺乏内在的沟通性与共同本质属性，因此不可能指出所有“统治类型”之间的类型流变性等本质特征。

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充分展现了类似人类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流变性。“群落内的形势总是处在不断流动变化的状态中。权力的平衡与否的状态每天都在受到测试，如果结果表明这种平衡太弱，那么，它就会受到挑战，然后，就会有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⑤黑猩猩群体每一次严重暴力冲突或者威胁性武力炫耀，都是对现有的组织结构和等级次序的冲击和颠覆，群体之间联盟也应运而生，又不断被拆散，再不断重组等，演绎出不同“类型”而不是不同“模式”、更不是不同“分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是韦伯笔下静态凝固的“统治类型”。再次回溯到人类社会存在之前状态譬如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性也早在现代人类诞生之前的黑猩猩政治活动中找到了萌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朗斯·德瓦尔所著系列黑猩猩论著开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超越了韦伯“三种统治类型”的学术范畴。一般而言，回溯到人类社会存在之前状态譬如黑猩猩灵长类的“类国家”与“类社会”状态，类型学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上具备以下若干范畴。

第一，“无国家威权”的自治社会。黑猩猩群体最初处于松散型的自治状态，没有绝对的威权首领。群落中年纪最大、同时威望也最高的雌黑猩猩“大妈妈”，深受群落其他所有成员的尊敬，作者把“大妈妈”比作是西班牙或者是中国式家庭中的老祖母，如同中国古典戏剧《红楼梦》中的“贾母”一般，在整个家族中享有最高威信：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笔下统治类型中的卡里斯玛型（charisma）权威。^⑥“每当群落中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时，敌对双方甚至包括成年雄性总是会转而求助于她……因为那时她可是群落的首领，不仅统治着所有的成年雌黑猩猩而且还统治着所有的成年雄黑猩猩。”^⑦在雄性黑猩猩“称王称霸”前的18个月时间里，“大妈妈”享有对其他所有成员“不怒而威”的特权——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在群落建立之初处于类似人类社会“无国家”但“有社会”的原始自在状态。

① 张文英：《当代景观营建方法的类型学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2页。

② G. C. Argon, 1963, On the Typology of Architecture, 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 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1965-1995*, ed. Kate Nesbitt,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 p. 243.

③ 吴放：《拉菲尔·莫内欧的类型学思想浅析》，《建筑师》2004年第2期。

④⑥ 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谢维和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0—116、111页。

⑤⑦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第258、54—62页。

第二,等级森严的王朝统治。雄黑猩猩一号耶罗恩、二号尼基与三号鲁伊特——这三个“外乡”雄黑猩猩——来到阿纳姆公园,尽管一开始遭到“大妈妈”为首“本土”黑猩猩抵制甚至攻击,但老谋深算的耶罗恩终于在“大妈妈”离开不在的日子里,摆平其他黑猩猩,“加冕称王”建立了“耶罗恩王朝”——一个以等级秩序为基本特征与运行机制的“王朝”统治。^①国家统治是一种政治秩序,社会一旦形成普遍遵守的等级秩序,等级地位就得到了上下一致的社会认同,等级秩序的“国家”威权由此应运而生。“大妈妈”试图夺回“领导权”的攻击得不到其他成员支持,甚至她亲密战友雌黑猩猩格律勒不仅不帮忙,反而在接触耶罗恩十分钟不到后就开始主动套近乎;“大妈妈”经营的“无国家”威权及其联盟被等级制“耶罗恩王朝”一举瓦解——这一“社会选择”完全有利于雌黑猩猩群体——繁衍后代、优胜劣汰是原初社会的最基本“善的生活”。

第三,权力制衡的共和“国家”。黑猩猩群体打破权力均衡通常都是从一方试探对方的实力及双方力量对比状况开始的,包括停止主动问候、威胁、抗命以及旁敲侧击攻击等多种挑衅甚至挑战行为。^②“耶罗恩王朝”是在雌黑猩猩们支持下形成的,雄黑猩猩鲁伊特虽然年轻力壮但势单力薄,他主动联合另一雄黑猩猩尼基,构成反耶罗恩及其雌性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鲁伊特-尼基联盟开始挑战老首领耶罗恩统治地位——历经不同联盟之间5次大规模“战斗”才取得了“胜利”。鲁伊特取得一号头领地位、尼基排列二号,老首领耶罗恩被贬至三号,由此出现鲁伊特-尼基联盟的贵族共和式类型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黑猩猩群体经历一段时间权力均衡之后,耶罗恩与二号头领尼基结成联盟,一起发动了推翻鲁伊特统治、建立新型“共和”模式的政治格局——这完全是出于政治“远见”而“人为”制造出来的新型“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尼基反叛是因为他能够与鲁伊特势均力敌,具有取而代之的登上一号头领“宝座”的可能性,为此他愿意联手原先“对手”雄黑猩猩耶罗恩;耶罗恩反叛并非为了夺回“统治权”,他自知论战斗能力不敌鲁伊特也不敌尼基,但他意识到尼基过于年轻不成熟且与雌黑猩猩们关系失和,无法独掌“大权”,支持尼基可以在获胜后成为超越“一号头领”的幕后领袖。事实证明,耶罗恩-尼基联盟的新型贵族共和式类型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取得了成功——并非原先“耶罗恩王朝”垂直等级制“国家”类型的复制翻版。老首领耶罗恩通过获取雌黑猩猩们支持,重新掌握了整个部落的控制权力——他把小青年尼基推到前台当作傀儡——自己在幕后操控一切几乎将尼基置于自己股掌之间。^③“我们就不得不去考虑他们拥有而大多数其他物种看起来缺乏的这种特别或额外的能力的性质问题了。”^④黑猩猩的社会操控行为绝对不是动物本能反应,而是有目的的思考与行动;这听起来似乎只有人类社会才出现的宫廷政变与贵族共和等政治现象,其实早已真实地在“黑猩猩的政治”活动中不断地重复上演。

第四,国家统治的民意基础。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的政治共同体生活,从“大妈妈”始建“无国家”治理的自治社会,经历“耶罗恩王朝”“鲁伊特-尼基联盟共和”“耶罗恩-尼基联盟共和”等多种类型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围绕统治权力展开了一系列的冲突、博弈与联盟,政治忠诚的无常性几乎是后盛年期雄黑猩猩们在权力角逐中普遍采取的战略策略。^⑤但是,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惊人一致的地方在于,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都必须依赖于坚实的民意基础,这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的一般结论。“大妈妈”依靠自身的人格魅力与长老权威,在“无国家”的自治过程中,完全依赖仰仗全体黑猩猩们的信任与支持;“耶罗恩王朝”时期,尽管进入了垂直权力系统的“王朝”统治,耶罗恩仍需要众多雌黑猩猩中的广泛支持——她们在阿纳姆公园里几乎一直坚定地拥戴耶罗恩——这是耶罗恩被“鲁伊特-尼基联盟”推翻后,能够东山再起,再一次以幕后“决断者”身份重获统治权,建立“耶罗恩-尼基联盟共和”体制的社会基础。尼基虽然曾经是名列一号头领的首领,但他一直没有得到过众多雌黑猩猩们的欢心与拥护,不可能拥有“一言九鼎”的统治权。特别是,鲁伊特第二次短暂地再次从尼基手中夺回领导权仅仅

① 陈心想:《黑猩猩的权与性》,《社会学家茶座》2011年第1辑。

② 赵芊里:《德瓦尔论黑猩猩的政治智慧》,《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③④⑤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第179、45、263页。

10个星期之后，尼基再次联盟耶罗恩重创了鲁伊特，并出乎意料、残暴地摘除了鲁伊特的“睾丸”——这是在同一群体冲突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极端恶性事件——激起了雌黑猩猩们的群体愤怒与普遍反抗。^①雌黑猩猩伊普斯特把这次恶行算在了尼基——长期不受雌黑猩猩们尊重与欢迎——身上，伊普斯特对尼基毅然发起了持久性猛烈攻击，并把他逼迫到树上长达10多分钟不敢下来——雌黑猩猩对于首领公然反叛进攻——这一事件十分罕见。^②自此之后，尼基的统治基础加速瓦解崩溃，直到耶罗恩公开停止支持尼基，尼基身处前所未有的众叛亲离之绝境；终于有一天早晨，在其他黑猩猩的咆哮与怒吼声中，尼基全速从那供夜宿用的建筑物中冲撞出来，直接跳进环岛护河之中，以“淹死”的方式“自杀”身亡，结束了他缺乏民意、暴政统治的一生。^③

显然，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内的组织关系、社会结构、政治运行机制等与人类高度相似，即有纵向的垂直统治，和横向的流动变迁，甚至剧场化的宫廷政治，演绎着黑猩猩群体“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的类型更替——尽管一个简单案例研究不可能穷尽所有类型黑猩猩群体“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但已经足以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性：共同体生活“质”的需求稳定性与“形”的变动合理性；不同类型具体生活方式与“善的生活”价值追求的内在同一性。总之，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的政治人类学研究表明，他们有意地使用自己的语言和神情，来表达情绪和实践意图，即有目的有理性对待群体生活，从实践中学习总结生活经验和教训，并作为处理“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的前车之鉴。“并非这一研究的所有结论都普遍适用于黑猩猩，因为控制着社会生活的规律部分地依赖于群体的生活条件和历史。每一个群体都发展出了它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变化总是围绕着各个物种各自所特有的某些基本主题转的，我们的黑猩猩群体的主题与其他黑猩猩群体并没有什么两样。”^④围绕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性，人类政治共同体与黑猩猩群体一样，依据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等生活条件与历史背景会演变出不同类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但其共同体生活的主题都是为了探索与实现符合自身实际要求的“善的生活”之目标。

类型学所包含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流变性与过渡性等内涵，早在人类刚刚进入城邦时期的政治共同体生活中就已初露端倪，被一些敏锐的先贤智者所捕捉并加以阐释，在经典典籍中闪烁着不凡的思想火花。早在古希腊时代与罗马时期，在罗马作为人质生活17年之久的古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4—公元前122）在批判那种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单纯形式混合起来所谓“混合政体”正当性与常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的思想火花，“没有一种政府体系会永久存在，因为存在着统治历史变化的自然周期”。^⑤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的最初思考，古希腊思想家的著述中多有蕴含。如柏拉图提出了“法治”与“非法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⑥他在《政治学篇》《法律篇》《米诺斯》中提出，是否法治是划分政体类型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标准。更难能可贵的，他还指出，所谓“法治”与“非法治”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是绝对凝固不变的，甚至可能出现具有一定流变特征、组合性质的“混合政体”。^⑦这正符合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的原初观念，即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模糊性、流动性与过渡性。尽管柏拉图提出了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等国家政体的最初类型学观点，但他没有对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学思维展开详尽分析，这一不足之处在其他著述中得到了弥补。^⑧美国有学者在研习《政治学篇》《法律篇》后指出，柏拉图的政体学说，也即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从过去的“法治”“非法治”类型区分，开始转变流动到“理想的共和国”与“实际中可能的政体”，即所谓“正宗政体”与“僭主政体”上来。“即一个人的统治、少数人的统治和多数人的统治都有其好的与变质的种类：君主政治、僭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暴民政治。”^⑨这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

①②③④ 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第261、262、265、253页。

⑤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⑥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5页。

⑦ 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智仁等译，2001年，第91—94页。

⑧ 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⑨ 加布里尔·阿尔蒙德：《政治科学：学科历史》，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钟开斌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2页。

的思想,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也得到反复阐释与发挥。但是,所谓“混合政体”并不是纯粹的某种单一政体,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是好形式,而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是坏形式等封闭式“混合政体”,即封闭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也会被打破,进一步演化发展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某种单一恒久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能够长久不变,后来制衡国家宪政学说的萌芽与兴起,就产生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型类型。“晚于亚里士多德两个世纪的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系统地阐述了对抗性权力的概念,但直到18世纪对抗性权力的概念才完全脱离混合政体学说。”^①可见,国家与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自然界物种分类学强调彼此隔离不能相通的那样,即刚性凝固;相反,人类存在的唯一形态即国家与社会关系,彼此相通互为连贯,始终处于自身调适之中,任何外在的氛围与条件,都不可能禁锢人类共同体追求“善的生活”的自由权利。

类型学从自然科学领域真正地走进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学术上的创新飞跃,是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完成的。类型学范畴运用于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意在通过探讨人类社会诸种复杂现象背后所蕴藏着的理论化进程及其演变规律,构建社会政治现象自身发展的完整逻辑思维。因此,只要某种社会体系的某一个或几个政治现象能够观念化逻辑化理论化,那么该体系系谱中其他诸政治现象同样所包含其中的内在本质也就昭然若揭、一览无余了。^②

三、观念发生与类型流变的内在同一

发生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学视域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两者具有内在同一性,但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仍处于分割断裂的现状。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以隐喻的形式蕴含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流变的内在同一逻辑。一方面,发生学与类型学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性与类型流变性,有助于洞察人类共同体生活“质”的需求稳定性与“形”的变动合理性;另一方面,发生学与类型学嵌入了政治人类学实证研究回到“问题原点”的逻辑思维,有助于把过去一直以来分割成为两个互为对立的个体具体性与观念抽象性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类不同类型具体生活方式与“善的生活”等价值追求辩证统一起来。

第一,观念发生的普适性蕴育了类型流变的多样性。发生学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原初观念是如何产生与演绎而来;而并不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结构,如何起源与变动而来。即发生学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观念发生与逻辑演绎,而非事件出现时空范畴。由于种族文化、历史纵深、地域分布、政见门类等原因,引入类型学探讨这一人类存在唯一形态、也即区别于其他任何生命唯一标志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多样性、流动性与过渡性的本质特征与内在逻辑。

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所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具有“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性,在于他们具备了“互惠合作的政治社会”“网络结构的政治组织”“社会结盟的政治行动”“和平和解的政治价值”“权力博弈的政治秩序”“社会调解的政治干涉”和“以德服众的宽容政治”等观念要素,并构成了黑猩猩及其人类所以能够以结构性政治共同体形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属性——即“善的生活”的政治目的。虽然这是黑猩猩群体共同体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但也是人类社会中政治国家产生、国家与社会关系运行的必要充分条件,即孕育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性。“互惠合作”“网络结构”“社会结盟”“和平和解”“权力博弈”“社会调解”和“以德服众”等为价值尺度的政治共同体生活,决定了无论采取何种由其文化传统、时代背景所营造而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类型——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中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先后经历“‘无国家’威权的自治社会”“等级森严的王朝统治”“权力均衡的共和‘国家’”和“政治统治的民意基础”等四个类型的变动调整时期,都具有典型的类型流变性——必

①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第90—96页。

② Snow C. C., Ketchen JDJ. 2014, "Typology——Driven Theorizing: A response to Delbridge and Fi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39(2), pp. 231-233.

然体现政治共同体“善的生活”的共同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让·皮亚杰开始提出发生学范畴时特别强调“同化”（assimilation）、“顺应”（accodation）与“内化”（internalization）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其间即不经意地蕴含了发生学与类型学之间的内在互嵌关系——发生学决定类型学的逻辑思维与价值尺度。^①这一观念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同化”表现为对于人类社会各类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整合，诸如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强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无国家有社会、有国家无社会等复杂多变的类型结构。“顺应”表现为透过各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即国家与社会关系外在形式，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动不居的共同体价值观念——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能够一而终地解决人类共同体生活的终极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变动性过渡性即类型流动性也就应运而生。“内化”则是发掘不同类型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所内嵌的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基本逻辑与本质属性，即国家与社会关系观念发生与类型流变的内在同一与辩证统一。简言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与类型流变等方面，“观念的发生强调知识结构生成的过程……这一阶段性的过渡不以事件和时间进行实证，而以观念进行推理”。^②观念发生的普适性蕴育了类型流变的多样性，这一思维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经常闪耀出宝贵的思想火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制度的实质……关系的模式决定着制度的基本架构，也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式和方向。”^③引入发生学能够超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现实具体事件产生的时空差异，洞察嵌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现实具体事件中的逻辑思维，即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性入手，来探讨人类社会存在的唯一形态即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万变不离其宗的类型流变性等常态特征。

第二，类型流变的过渡性诠释了观念发生的抽象性。人类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思辨性成果表明，人类社会究竟以何种特定的政治共同体生活方式来实现自身“善的生活”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统一答案；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政治统治，都是依据其自身文化传统、时代背景对于人类存在唯一方式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适应与抉择——尽管这些适应与抉择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所结成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具有“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的类型流变性，是因为它短短4年（1975—1979年）时间内，就经历了“‘无国家’威权的自治社会”，“等级森严的王朝统治”，“权力均衡的共和‘国家’”和“政治统治的民意基础”等多种类型的政治生活方式。每一种类型的产生、运行与变更，并没有特定的时间与人物等界定，“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似乎是一条岁月长河，在阿纳姆公园黑猩猩群体政治共生活中静静地流淌与前行，也并没有“模式”或“分类”意义上的隔断与壁垒；相反，每一种类型似乎具有一定的过渡性即多样性，又似乎在反复不断地诠释与印证他们合而为群、扎堆而聚形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即“互惠合作”“网络结构”“社会结盟”“和平和解”“权力序阶”“社会调解”“以德服众”等为核心价值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观念发生性。德高望重、公平正直的“守护神”雌黑猩猩“大妈妈”，足智多谋、蛊惑人心的“不倒翁”雄黑猩猩耶罗恩，反复无常、反遭“极刑”的“短命”雄黑猩猩鲁伊特，众叛亲离、“自杀”身亡的“暴君”雄黑猩猩尼基等“政治人物”，以及他们所建构变迁的模糊多变不同类型的“类国家”与“类社会”关系，无不以隐喻的形式揭示出政治共同体生活的真谛，即不在于一时的强暴与谋略，而在于永恒的爱心与善意。

让·皮亚杰强调，发生学并非只是思辨学问，“皮亚杰的创造性在于明确指出这些范畴是发生的而非先验的……‘发生’是发生认识论的生命所在，是实现从哲学认识论向实证科学跨越的关键一步”。^④观念发生具有抽象性，但需要通过具体多样的类型区分才能展示其内涵。同时，“类型学”（typology）最初源于建筑艺术，是一种特定具体生活方式的现实反映。正是由于发生学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当它运用于国家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第16页。

② 汪晓云：《人文学科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1页。

④ 李其维、弗内歇：《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若干问题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与社会关系之中,必然引入跨学科互相阐释等比较分析方法,着力于通过分析外在的权力-权利互动博弈,透视其内在的观念构想与逻辑思维,并在多学科比较基础上探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与规律。标志着政治人类学“诞生”的《非洲政治制度》开篇指出:“政治哲学家的理论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所研究的社会,它们没有什么科学的价值。”^①这一论断蕴含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生学观念,同时又从人类学特有的“田野研究”与“民族志撰写”等实证维度,揭开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篇章。发生学与类型学都无一例外地秉承了政治人类学以实证研究为原点的逻辑思维,即从实证科学角度,把观念逻辑思辨与人类生活方式都指向了具体过程,而非一般抽象与整体概括,这样就把过去一直以来分割成为两个互为对立的个体具体性与观念抽象性完美地统一起来,同时也把人类不同类型具体生活方式与“善的生活”美好追求辩证地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的选择,在本质上蕴含着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审美态度。^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论证,国家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具有过渡性特征,社会尤其是共同体社会才是人类存在的永恒形式,这从侧面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形式上具有流动性过渡性、在实质上具有同质性一致性等。“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是社会身上的赘瘤……一旦社会达到迄今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③国家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的发展超越了国家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国家就要消亡,而替代国家的将会是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并以不同的外在类型表现出来。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国家学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学的重要知识,并没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隔离出水火不容的“界线”,相反,“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就是社会结构”。^④社会孕育着国家的形态与流变,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无限的类型流变性,诠释着人类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观念发生的抽象性与价值观。这一基本思路在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述中也得到了不断丰富与发展,“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⑤国家与社会具有交替变动性,两者具有某种连续性与过渡性;形式上对立矛盾,实质上本质同一。又如,W.布鲁斯对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阐释过一些类型学范畴的学术观点,给我们回顾与探讨长达近两百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定启发。“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一个阶段,而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⑥作者身处“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但他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成是当时苏联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教化的“苏联模式”,相反,他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其实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批判与变革,两种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割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同一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对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替代”方案。但无论何种“替代”方式,无论是市场自由主导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无论是私有制奠基还是公有制固其根本,其目的都在于寻找社会发展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人类不断探索完善共同体“善的生活”的实现方式。

总之,回到“问题原点”并不是纠缠黑猩猩灵长类或者人类社会最初状态譬如原始部落,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剧变裂变等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与是非曲直,而是借此从观念逻辑上探讨:从发生认识论与类型学的复合角度进一步“再祛魅”(re-disenchantment)^⑦,扬弃深藏其中某种或类神学或类宗教色彩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辨性定势思维,才能弥补国家与社会关系观念发生性研究尚缺、类型流变性探讨不深等不足。发生学与类型学,虽属不同学科的研究范畴,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方面,强调跨学科思维方式。发生

① Meyor 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 eds. 1940,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转引自董建辉:《政治人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② Aldo Rossi, 1982,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p. 35—41.

③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5页。

⑤ 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0页。

⑥ W. 布鲁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郑秉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

⑦ 此处“再祛魅”,意指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过度哲学思辨化现象的反思与批判。Weber, M.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Trans. by E. Shils and H.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p. 55.

学从政治共同体生活的观念上阐明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形态，而类型学从方式上揭示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具有多样性与过渡性。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观念发生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选择，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类型选择验证了人类只有在不断调整完善国家与社会关系过程中才能实现“善的生活”的政治目的。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特色政治学三个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18BZZ010）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7年年度主题研究项目、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王胜强）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Epistemology and Typology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Chimpanzee Politics*

TAO Qing, MA Fangyun

Abstract: Going back to the state before the existence of human society, chimpanzee's "similar state" and "similar social",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problem origi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se factors are pregnant with the concept genetic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which determines the type rh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and the common concept of the "good life"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chimpanzee group has the type rh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milar state" and "similar social".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lies not in the substantial violence and strategy, but the eternal love and kindness. On the one hand, the concept genetics and type rheolog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embryology and typology,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qualit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hape" in the human community. On the other hand, embedding embryology and typolog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ith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problem origin", can help to combine the two opposing individual concreteness with the conceptual abstraction, and can unif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life and the value of "good life".

Key words: concept genetics, type rheology, "problem origin", "good life"